

立笔成军的西元小说

□艾 翔

伴随着《战狼2》和《红海行动》高歌猛进的票房,相关的讨论更为热烈。作为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定位和期待势必不同。但是不得不承认,《战狼2》令人难以亲近的部分原因,包括对战争过于浪漫化的表述,对个人能力的无限夸大导致重新坠入个人英雄主义的狭隘立场,反而进一步是对活生生的人的遮蔽。当然这并不是说《红海行动》就是完美无瑕,社会主义国家军事传统和近现代以来全球史视野的欠缺,单向度强调调枪械、战术令人物淹没在技术倾向之中,都让我同这些作品产生理性和情感上的疏离。正是这种疏离,让我更加珍视西元小说的独到贡献。

西元的创作必定会产生在军事文学序列之中,同时又显然自成体系而区别于一直以来的军事文学范式。相比“无名英雄”这种宣传式的措辞,我更信任傅逸尘对“反英雄叙事”和“英雄主义重构”这样更具学理性的论断。孙武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兵者诡道”的思想,但《Z日》中王天心两次被东瀛女谍潜伏刺探的虚虚实实经历都过于粗线条,正可以窥见其中的传统,即英雄小说中有很多侠义小说的元素,人物豪逸粗野,只用配角补齐心机。这部并非完美却依然精彩的作品,各方面都值得品味。“Z日”之立因为有着著名的“D-Day”、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存在,一部恢弘的造神话语实践,塑造了艾森豪威尔以及配合行动的巴顿和蒙哥马利这些英雄,掩盖了苏军艰苦卓绝的东线攻势,形成了欧美的世界史话语霸权。然而那些在抢滩登陆以及攻城协同中牺牲的盟军甚至德军士兵,在神话中没有位置。用字母表最后一个字母作为行动代号/小说标题,可能是“中国之日”、“终止战争之日”的缩写,也可能正代表了西元独特的历史观、英雄观,他的笔墨要留给王天心这样有明显失误的普通军人,沉淀到最后,体察他们鲜活的内心,在这里没有摧毁式输赢的“D”,只有人性的“Z”。

西元不是一个理念式作家,在他的观察里英雄感的消散跟时代变迁也有关系。西元看到了农民军人的外部困境,《枯叶的海》中也是王天心,面对城里来的女学生梅,不但没有厌弃其妩媚,反倒因其强悍而心生自卑。除了这种反向的阶级性意识,英雄性的消散与时代变迁的另一面相关,除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军事文化的社会影响力逐渐让位于经济因素,20世纪9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消费群体的形成,让可支配收入拮据的中下层军人体会到了巨大的落差,带着100块钱手表的王天心看着柜台里百万元手表时,塑造英雄形象的根基也就垮塌了。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社会转型期的很多现象和观念都成交错状态,20世纪80年代军队文化虽然受到动摇,但传统带来的自豪感还是很实在的,如西元清晰的梳理,20世纪90年代末一系列重大国际国内事件的爆发,刺激了军费大幅上涨,但也造就了《壁下录》中的腐败。到了后者书写的新世纪,军人收入提高,武器装备飞跃,但对人的信仰也造成了严重的侵蚀,呈现出另

一种交错状态。如果说《枯叶的海》中因为时代变迁造成认同感和关联感落实的困难,《壁下录》则又反其道而行,摆脱了传奇小说的模式化、脸谱化写作方式,甚至整部作品几乎没有了原来意义上的“正面人物”,将犯有重大过失的人还原为活生生的社会存在,没有角色的正反界定,只有人物内在的正反面,也就从文件、新闻报道和政治话语中区别出来,既贴近了读者的情感体验,又比小道传闻更加光明磊落。这是西元的创作意图,因为小说明确地将主角的检查材料同其回忆分隔处理。既然有实力相当的正反面,过去意义上的英雄形象既难以树立,也绝不垮塌。

作为西元最著名的代表作,《死亡重奏》的这种矛盾性体现更为鲜明。它有两种介入方式,一种是具体人物的显微描摹,一种是宏阔空间的整体扫视,后一种人物往往是无名的,比如在阵地遭受猛烈炮击后,土皮翻动,慢慢站起一个战士,沙尘从上洒落,推开战友架起重机枪,“瞪着垂死挣扎公牛一般的红眼珠”,这正是一个标准的希腊神话半人半神英雄出世的场景。不过“英雄”是作为“人物”的背景出现的,因为一旦要处理人物的具体经验,就会发现英雄所负载的那一套宏大话语只能部分作用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所以魏大骡子这样的人,具备很多英雄应有的素质,但塑造英雄的基础和模式都被打碎了。王尽美在内外交迫的严酷环境中,举枪瞄准哨兵的野狗,因为手抖准心一直乱晃,战斗质量严重下降,几与平民无异,可以说军人之表已经基本丧失殆尽,但其军人之魂却愈发坚硬。

2016年出版的小说集《界碑》体现出了西元的创作脉络,较早两部中篇小说《界碑》和《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分别同后来创作的《色·魔》《死亡重奏》形成呼应。《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和《死亡重奏》都涉及到抗美援朝的历史,前者带有一定传统因素,军人的果敢、坚毅、威猛以及悲壮都有所展示;同时因其具备不少革新先声,罗三闯、郭抗美这些士兵也出现了认同感、崇高感难以建立的问题。西元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转型过程中,军队文化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面临的问题,即“道德化”和“职业化”之间的侧重与选择,“子弟兵”、“鱼水情”是否或如何传承。相比“典型”、“英雄”,西元更关注“人”,或许这正是他的军事文学独辟蹊径的核心奥义。但我相信西元并非决绝地舍弃“典型”和“英雄”,毕竟《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历史和现实多次闪回的写作方式表明他相信历史对话的可能。

《界碑》和《色·魔》的关联点是在写喝酒应酬,探讨市场时代下资本和劳动的历史意义。《界碑》中影响战斗力的外在消极因素有二,其一是靠关系办事的腐败,其二是信仰的匮乏。可见创作这部作品时的西元认为军队传统的不可缺失,但他丝毫不否认面对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普通军人出现的传统与当下、崇高与世俗、精神与物质的两重性。

面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西元的做法不是回避,不是放冷箭,也不是赤膊上阵,而是迂回包抄杀入险境。运用大量的虚写,营造幻境,借用通感进行感官描写,设置隐喻,虚实结合并交叉穿替,游走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用高度艺术化的手段生动再现了时代之殇。



因为带有传统军事题材的印记,《界碑》多少闪烁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色·魔》就显得更为冷峻严肃。作为有革命史、笃信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家,黄某某以一派无所不能的面貌,拥有对投靠他的普通女孩命运的摆布能力。“色”对于男人而言是“魔道”,对于女人而言是“魔力”。“色魔”当指黄某某,但如果中间被间隔开成为“色·魔”,则成为揭示表象与结局的社会批判,不设置真正的英雄,反倒是西元的洞察和悲悯。

作为十分少见的非军人主角军事题材,《黑镜子》在作家创作序列中占据特殊位置。留德量子物理学家王天心在“大跃进”时期进入西部戈壁核武器研制基地,对于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他保持着既不反感又绝对无感的冷漠距离。正是这种距离感让人物迅速发现时代的内核,并与“十七年”和“新时期”的书写模式区隔开。西元的书写进行心灵的体察,超越了伤痕小说的叙事模式。

通过英雄的缺位,提供启蒙者对历史洞察的舞台,如果要活的纯粹和明白,必须将关注重点放回历史。《Z日》主干故事发生在2041年深秋到年终,暗中牵涉着1941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这一中点,是年12月远征军组建,同世界真正连接起来。这样来看西元如此写作用意大抵有二,首先是配合阅读《死亡重奏》《枯叶的海》和后来的《黑镜子》《壁下录》等作,乃是一部关于我们自身历史尤其是军队文化的警示录;另外就是用跳动的节奏激发读者对百年侵华战争史的思考,从而更加清晰敌人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历数从唐

白江口之战、元日战争、明万历朝鲜战争以及小说处理过的清甲午战争和民国抗日战争,也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变迁的历程。以日本这个他者为镜,从天下朝贡体系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形成了自己的国家观念,走上了自己的政治道路。从“警示录”的线索再回望《界碑》,不得不感叹作家的坚韧执著与艺高胆大,如此宏大的命题一直是依靠小人物而非英雄体系来支撑。

面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西元的做法不是回避,不是放冷箭,也不是赤膊上阵,而是迂回包抄杀入险境。运用大量的虚写,营造幻境,借用通感进行感官描写,设置隐喻,虚实结合并交叉穿替,游走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用高度艺术化的手段生动再现了时代之殇。

不采用以往的英雄体系,但西元自身还是不乏英雄气的。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拨,体现出的是西元的成熟而非青涩的莽撞冲撞,真正的军人一定是不畏战且不好战,轻言战事者多半对战争有简化或浪漫化的想象,基于同样的原因西元坚定地走在残酷现实主义的路上。

作家西元,一个人,一支笔,一身正气,就是一支军队。2017年新出版的小说集《死亡重奏》收录了作家最具才胆识力的四部作品——《Z日》《枯叶的海》《死亡重奏》《壁下录》,如一柄锋刃,但西元的部队还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执行新的作战任务,因此也更让人期待更漂亮的经典战斗,更新的装备列表,更大规模的集结。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光的味道』以及『生活指南』

——读阿西的《生活指南》

□李浩



以前与一位朋友在山上谈话的时候,我曾面对绵延不绝的群山小语说,我喜欢像驴子那样蒙上眼睛永不止息地绕着磐石工作。然后,他带着我走向山顶坐在大石头上,开始俯视山下的灯火静默。我想他和我一样,对那种持久的、自我不断生发的耐力,并在诗歌中持续地爆发生气感到认同。将一首诗推向极致,使它达到神妙的感觉,是我一直所着迷的,这也是对诗人的艰难考验,我对这样的写作者充满敬畏。这种纯洁的精神,更是在向我们印证那句旷野中的呼告:“所有伟大的诗歌,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在“北京青年诗会”这个群体里诗人中,阿西身上那种对写作保有的持久与坚忍的品质尤为显著,他在诗人中总是保持一种和而不群的立场;因此,我们互相也是聊得来的。阿西生于1962年,对于一个已进入“五十而知天命”的“剩余的时间”的人,我一直钦佩他诗歌中所散发的青年气质和浪漫精神,我想这是智力过剩的表现,是荒诞的现实与日新月异的主体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共同产生的斥力与撕扯所为;也是对当下无比纷繁的经验世界的分享。他总让我觉得他在这个时代之间维系着某种秘密的废止与敞开:带着及物的伦理学和社会学进行力所能及的回应。这是我对阿西近几年的诗歌写作的大致印象,他这几年的写作给我最大的愉快是:他越写越自信,越写越接近光,在诗歌中他对自己语言的净化方面,对自我的诗歌文本与当代新诗之间的借鉴、吸收、反噬方面,在经验与技术上都让他的诗歌文本打开了许多的语言路径,也沉淀了许多丰厚的阅读内涵。



在“北京青年诗会”这个群体的诗人中,阿西身上那种对写作保有的持久与坚忍的品质尤为显著,他在诗人中总是保持一种和而不群的立场。我一直钦佩他诗歌中所散发的青年气质和浪漫精神,我想这是智力过剩的表现,是荒诞的现实与日新月异的主体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共同产生的斥力与撕扯所为;也是对当下无比纷繁的经验世界的分享。他总让我觉得他在这个时代之间维系着某种秘密的废止与敞开:带着及物的伦理学和社会学进行力所能及的回应。

拿到阿西的诗集《生活指南》时,我还是头一次这么集中地读他自2013年之后的部分诗作,我很感谢他的诗歌给我带来的一些愉快的思考。他那种“劳绩之诗”的工作精神,让我想到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诗集《人之链》(《Human Chain》)中的那首“舔铅笔的”一诗:

为了怀念他,凝视着那些颜料
它们润湿,放大以后
就像科伦巴僧袍上的墨痕,

科伦巴去世那天,倒是不用去
按住一匹马,他坐在路边的时候
马朝他走了过来,

正如传记里写的,“他浑身倦意”。
而马“伏在他的胸口哭泣,
打湿了圣人的衣服”。

然后,科伦巴对他的侍从说:
“达尔麦特,让他哭吧,让他哀悼我,
哭个够吧。”

关于这节诗,诗人王敖在《读希尼的〈人之链〉》一文中谈到,“父辈从事的体力劳动也是一种艺术,圣徒的智力劳动同样消耗大量体力。他们勤俭的生活和毕生的努力是社会存在和进步的基石。有了这些,米沃什所信任的‘意义’和叶芝信奉的‘对爱的想象和记忆’才能延续下去。”对于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极其发达的国家来说,我们对劳作的意义,有种天然的自明性和亲缘性,在这方面我们的传统从《诗经》《楚辞》《乐府诗集》开始,为我们留下了经久不绝的语言宝藏,不过这股取之不尽的力量,也在驱使我们不停

地往现代汉语中最复杂最幽微的禁地挺进,重构“总体性世界”和现实与写作者的主体。

面对手上这个桃子
我只能写它的完美。但是,当我咬下去

咬到的竟是一只蠕动的黑蛆虫。
——《代表作》

让它们尽可能自由地结出果实
结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结出与时间无关的红绿星
——《停车场边的南瓜花》

在任何一个人那里,都可以找到一条暗道
找到从夜晚蜿蜒而来的流水,唤醒自己的写作
并安葬自己的写作
——《诗人藏书》

你用雪雕塑一座城堡,马车和家族
你感到荣耀,惊喜于苍茫中刺骨的颂赞
——《冰雕人》

进入下坠的世界……阳光和沙滩是黑的
——《安眠药》

我不再遵从太阳的规则,克制着焦躁
克制着隐隐的不安,像一个放弃耕作的农夫
任由良田废弃,长满苍耳和野草
——《这些年》

你跪在沙地上,像朝觐者
望着漂移的陆地,飘逸的湖泊
血液慢慢凝固,形成坚硬的云
你终于见到了坟墓中的人
——《墓碑》

他们曾把一车车煤从地下挖出来
值钱的部分被别人卖掉转化成生活的热能
剩余的无用之物丢弃在一边,现在
这些残渣像愤怒的狮群向他们凶猛扑来
……
你是否看见一只无形的黑脚
悬在头上,随时间向自己踩下来
——《死亡新闻》

这些诗句,均出自阿西的诗集《生活指南》的第一辑,我将这些诗句列举出来,是因为我觉得阿西的这些诗歌,乃至整本诗集里涉及到的伦理问题,是值得我思考的。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它呈现的是人类的存在及其可能状态,它在本质上是无用和不可言说。从人与世界的关系上,我将阿西的《生活指南》这本诗集中涉及到的伦理问题分为四类:一、人与自然,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纠葛,譬如对自然的神化、人格化、敌对化,这在阿西的诗歌中比比皆是。二、人与历史,主要涉及历史哲学,常常用无法勘证的、个人化的民间史消解所谓的正史。譬如他的《三苏园中的柏树》《秦皇怪柳考》《再谒苏轼墓》《谒高适墓未果》《雨中戏作》《做客黎族诗人唐鸿南家》等等,“在古代,有一些地方诗人,或者一些羁留较久的过客,总要寻到当地一个地理要点,站准了位置,顿觉山形地胜,草木云泽,人文兴废,个人际遇,笼罩而来,酿成一股不可扼的诗思,一番刻苦,便成了文字建构。这种传统留下了《登楼赋》《滕王阁序》这样的文字地标,也大量存在于无数无名山头的风雨碑刻。”这类诗兴盛,难写,特别考验一个人刷新与转化语言的能力,在这个传统中,如果想写出那种“洞灵性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的理想诗文,你首先必须得是一个不能朽坏的自我繁殖:还要能驱动与内化沉眠的传统经验的繁殖器。三、人与社会,其实就是诗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各种纠缠对个体经验的渗透,而你必须面对,大到社会运动,热点事件,小到日常生活,譬如《死亡新闻》《心不在焉》《霾》《生活指南》等等。四、人与人,后面那个“人”在语法上是复数。伦理在我们肩上有数千年的“负担”,我认为诗歌的任务是不停地去发明它。阿西的诗歌采取的形式,正如米兰·昆德拉在谈小说时提到的那样,“把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为轻浮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从来就是我的雄心。而且,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上的雄心。一个轻浮的形式与一个严肃的内容的结合把我们的悲剧(在我们的床上发生的和我们在历史大舞台上表演的)揭示在它们的可怕的无意义中”。我和阿西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深远的交谈。关于阿西的长诗,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揣摩它们,因为在“光的味道”里,阿西的《生活指南》告诉我们:
每天运动超过两小时
即使输掉年华也不输掉正义
(作者单位:《十月》杂志社)